

中国文明起源 “原生型” 辩正

叶万松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 洛阳 471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lational materials about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which considers that at the period of before Yangshao Culture matriarch was transforming patriarchy, private wealth had appeared which opened the door fo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lanship. At the period of Yangshao Culture basic of civilization had appeared, such as bronze, character, Palace build for royalty sacrificing, ancient city site etc., and the earliest ancient state was came into being. At the period of Longshan Culture slave-owner's state was established. At the whole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Central Culture which depended on the developed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central of world, not only made Central Plains became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made the Central Plains only finished the whol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and became the first area in where the first slave-owner's state was established.

Key words economic form;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Central Plains; Central Culture; basic of civilization

摘要: 本文梳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脉络, 认为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 出现了私有财富, 为氏族制度的瓦解打开了第一个缺口; 在仰韶文化时期, 出现了铜器、文字、宫室礼仪建筑、城址等文明要素, 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古国; 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在整个新石器时代, 中原文化以其发达的农业经济和居“天下之中”的地域优势, 不仅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地, 而且还使中原地区唯一顺利地完文明起源的全部历史过程, 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地。

关键词: 经济形态; 文明起源; 中原地区; 中原文化; 文明要素

在当前我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 有两个地区的史前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关注, 一个是辽西地区, 另一个是中原地区。

辽西地区, 指的是燕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山脉之南、浑善达克沙地以东、辽河以西的地区, 包括今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上古时期大概属于《尚书·禹贡》“九州”中“冀州”的北缘, 《周礼·职方氏》“九州”中的“并州”、“幽州”之地。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黄土——沙地的过渡带, 在历史上是我国北方农牧业的交错地区。

根据文献记载, 史前和夏商周时期的辽西地区, 就生活着被通称为“北翟”、“北狄”的部落集团。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 辽西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先后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

小河西文化(距今8200年以远)、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4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7200~6470年)、红山文化(距今6710~4920年)、富河文化(距今53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辽西文化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区之一。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曾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中原地区位于黄河中游, 包括今河南省、陕西省关中地区、甘肃省东部、河北省南部和山西省南部, 上古时期属于《尚书·禹贡》“九州”中的“豫州”、“雍州”和“冀州”之地。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 该范围内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先后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距今10500~8600年)^①、磁山文化、裴

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李家村文化，或通称为前仰韶文化（距今 8000 ~ 7000 年），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 7000 ~ 4600 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或通称为中原龙山文化（距今 4600 ~ 4000 年）。中原文化区地处“九州”的腹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区，历来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或称起源地）、华夏文明的摇篮。

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提出国史的核心是中华国家的起源问题，将中华国家的起源概括为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次生、续生三种发展类型。他认为北方地区为原生型，以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最早的古国）、四千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连锁式城堡带（长城原型）和二千年前秦始皇碣石宫（国门）为标志；四五千年间到二千年前的中原地区为次生型，以夏商周三代为中心，包括以前的尧舜，其后的秦；以秦汉以来先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满族三代为代表的北方草原地区则为续生型。于是，在中华国家起源，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辽西地区古文化以“最早的古国”被拔高为文明起源“原生型”的标志，年代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中原地区被降格为文明起源的“次生型”，即“第二次生成的；间接造成的；派生的”^②的类型，从时间段来讲是以三四千年前的夏商周为中心，往上也只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尧舜。这种观点，对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华夏文明摇篮的传统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曾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甚至有人提出要依此“重建中国史前史”，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但这种观点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的史前历史，现在是应该认真地予以辩证的时候了。

本文拟就上述中华国家（文明）起源的三种发展类型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华国家的起源问题。我们认为，中华国家的起源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内容，研究国家的起源实质上就是研究文明的起源。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所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也就是研究中国氏族社会制度解体的过程、国家组织的产生过程、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而这个历

史过程就发生在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代建立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或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铜石并用时期”），距今约 5000 ~ 4000 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具体对象就是这个时期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其中关于文明起源地的探索，就是研究中国文明最早的开始点^③。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以为：起源者，“开始发生”^④也，研究中华国家起源、中国文明起源，就是研究中华民族的国家（文明）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所以其研究对象，自然而然地要锁定在中华民族四五千年前那段由氏族制度解体，继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由此，无论是夏商周三代（约公元前 2070 ~ 前 256 年）、夏家店下层文化（约公元前 2000 ~ 前 1500 年）、秦始皇碣石宫（公元前 221 ~ 前 209 年），还是以秦汉以来先后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满族三代为代表的续生型（公元前 221 年以后 ~ 公元 16 世纪以前），均晚于或明显晚于中华民族国家（文明）“开始发生”的历史阶段，自然都不应列入中华国家（文明）起源的研究对象。这就好比我们探索河流的发源，寻觅“河流开始流出的地方”^⑤，只能寻其干流的源头，而不能把其支流的源头视作河流的发源地，道理是一样的。

这样，在所谓的中华国家（文明）起源三种发展类型的标志性或代表性的古文化中，就只剩下距今五六千年前“原生型”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前“次生型”的中原地区尧舜文化了。现在我们就辽西地区和中原地区史前文化中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彻底弄清楚他们在中华国家（文明）起源中的历史地位。

一、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史前经济形态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⑥“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⑦。探索我国文明起源，也必须遵循史前经济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就是坚持了这一观点，并有极其精

辟的阐述:“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名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了‘革命’,人类不再象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以渔猎经济为主,靠天吃饭。这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次大跃进,而为后来的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⑧由此,客观地评价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⑨,就成了客观评价这两个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历史地位的关键。

唯物史观认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⑩。因此,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研究辽西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经济形态,就成了客观评价上述两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历史地位的必由之路。所以,本文也就从辽西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经济形态的比较谈起。

(一)辽西、中原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形态

1. 辽西地区

辽西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小河西文化,是以采集和渔猎为其食物来源的主要获取形式,生产工具以打制厚体亚腰形砍砸器和较发达的细石器为主。兴隆洼文化时期则出现了原始农业,但尚无家禽家畜饲养的证据。

兴隆洼文化的农业遗存,主要有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籽实两类。遗址出土有锄形器、磨盘与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而且有了一定的数量。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每座房址居住面上都曾发现一件或数件锄形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了碳化谷物籽实,经鉴定为黍和粟,其中黍占90%,粟占10%^⑪。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众多以细石器为主的狩猎工具,骨鱼镖等捕捞工具,以及大量鹿、野猪等动物的骨骼,说明渔猎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可见当时农业虽已出现,但还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

2. 中原地区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系2009年新发现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考古遗址,当时是否出现原始农业,目前尚不清楚。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在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

文化、李家村文化所在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仅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了耜耕农业的阶段,而且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各遗址出土的农具在工具中所占的比例大,农具种类多,且配套使用,清晰地显现出原始农业操作序列。如石斧用于砍伐和土地开垦;石铲、角锄用于翻土播种;石刀、石(蚌)镰用于收割;石磨盘、石磨棒用于粮食加工。(2)相继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黍、粟;河南郑州沙窝李遗址发现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黍等农作物碳化籽实。根据对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年代重新测定和“粟灰”的植硅体测定,在距今约10300~8700年的样品中,灰化粮食植硅体全部是黍;而在距今8700~7500年期间,依然是以黍为主,开始出现少量粟的植硅体,含量低于3%^⑫。这说明,中原地区在8700年前就开始驯化黍,在7500年前开始驯化粟,是我国粟作农业的起源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碳化稻谷籽实,说明中原地区的淮河流域在距今9000~7800年间已种植水稻^⑬。

(3)农业生产已具规模,收获的粮食大量被用于储藏。如在磁山遗址发掘的468个灰坑中,有80个长方形的灰坑为窖穴,底部都堆积有黍灰、粟灰和碳化籽实,层厚一般为0.3~2米,其中10个窖穴的堆积厚2米以上。有人估算这80个窖穴储粮总体积109立方米,谷物重量5万公斤以上^⑭。(4)农业发展带动了牲畜饲养和手工业的发展。例如酿酒业,最近中美学者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陶片上的附着沉淀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沉淀物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稻米、米酒、葡萄酒、蜂蜡等化学成分相同,很有可能是米酒内加入葡萄或山楂等水果进行发酵酿酒^⑮。

前仰韶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已出现家禽家畜的饲养,各遗址都有猪、狗、牛、鸡等家禽家畜骨骼的出土。有学者对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材料进行研究,认为我国最早的家猪、家狗、家鸡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最早的家牛出自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家禽家畜饲养已初具规模,一些遗址出土的家禽家畜骨骼比重略低于或已经超过野生动物,如河南浉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里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59%,鹿科等野生动物占41%;陕西临潼白家遗址家养动物占全部

动物总数的 60%，野生动物占 40%^⑧。这表明中原地区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家禽家畜饲养取代狩猎、成为获取肉类食物主要来源的发展态势。

有学者对裴李岗文化的经济形态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裴李岗文化遗址无论其面积的大小，发现房基、灰坑和墓葬数量的多少，在出土的遗物中，都有数量较多和种类齐全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经济生活相关的生活用具，而渔猎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除个别遗址外都不多，尤其是裴李岗、沙窝李、莪沟、石固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更少。说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农业占有重要的分量，而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也进行渔猎生产，作为生活的辅助。由此认为“裴李岗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的农业聚落遗址”，“裴李岗文化具有鲜明的农业文化色彩”，“人们的经济生产已以农业为主”^⑨。

(二) 辽西、中原两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经济形态

1. 辽西地区

在赵宝沟文化出土石器中，石耜、石锄、磨盘和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占一定的比例。如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出土的大型石器中，耜占 26%，磨盘占 7%，磨棒占 11%，锄占 1%。此外经微痕研究，部分细石叶是作为复合工具石刃而用于谷物收割^⑩。赵宝沟文化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发现了大量野生动物，如鹿、猪、狍、鱼等脊椎动物的骨骸，蚌科、蓝蚬科等软体动物的贝壳，以及一些野生植物如胡桃楸的果核。例如赵宝沟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用于敲砸兽骨、刮削鞣制兽皮的石斧、斧形器（占大型石器总量的 37%），用于切割肉类、解体动物的石质尖状器、刮削器、细石叶，以及用于狩猎、采集的石镞和各种骨角器，出土野猪、马鹿、斑鹿、狍等大量野生动物骨骸，有学者推算它们生前的体重总计 4592.39 公斤，可提供的纯肉量为 2296.19 公斤^⑪。这说明采集、狩猎始终是其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农业虽较兴隆洼文化时期有所发展，但依然处在相当原始的阶段。

赵宝沟文化尚无家禽家畜饲养的确切证据。如赵宝沟遗址出土的猪，有学者在对有关动物骨骼鉴定报告进行认真地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均为当时人狩猎所获的野猪”^⑫。

红山文化发现数量较多的农业工具，如石耜、石锄等掘土工具，石刀、磨盘、磨棒等收割和加工谷物的工具。一些学者在论述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时，通常都是以系列农具出现且较赵宝沟文化先进、出土比例亦在增加等为主要依据，以制陶、制玉技术的发达，以及遗址分布密集、人口大量增加等为辅助证据，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农业占主导地位。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红山诸文化 6000 年历史长河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不是农业而是采集和渔猎，就是在农耕经济占较大比重的红山文化，也没有失去过重要地位。应该认为，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一样，都是属于农业和采集、狩猎、捕捞相结合的混合型经济形态，虽然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狩猎依然是红山文化先民们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的细石器中，最常见的有小石片、细长条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石核、石钻、石镞等。其中，体薄刃锋的长条形石片和做复合工具的小石片，连同刮削器、圆刮器、短刮器，可能是切割皮肉的工具，凹底或平底三角形石镞，应该是用作射猎工具或武器，这些都应是狩猎发达的证据。

红山文化已开始饲养家禽家畜，种类有猪、羊、牛等，如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出土的猪和绵羊骨骸^⑬，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女神庙”、积石冢出土羊、猪和牛的骨骼^⑭，东山嘴遗址出土有猪的骨骸^⑮。

年代与红山文化晚期相当的富河文化，出土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应是掘土和谷物脱壳工具，证明有了原始农业，但出土较多的是石质和骨质的渔猎工具，如尖状器、刮削器、镞、鱼钩、鱼镖等。富河沟门遗址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骸，经鉴定有野猪、鹿类（包括麝、麂、麋）、黄羊、狐、松鼠、狗獾以及洞角类、犬科、鸟类动物等。其中鹿类约占 50%，野猪占 17%，狗獾占 9%，洞角类最少，仅占 2% 左右。这些动物骨骸全部是狩猎获取的野生动物的骨骸，没有发现可以肯定属于家禽家畜的骨骸^⑯，可见渔猎经济非常发达，占据主导地位。

2. 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农业，从农具的种类和比例看已经进入了耜耕农业的发展阶段。中原各地普遍发现粮食作物籽实，如在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邠县

下孟村,河南洛阳王湾、渑池仰韶村、郑州大河村、林山砦,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均发现有粟或粟壳;在陕西临潼姜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黍;在陕西华县泉护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稻谷痕迹,等等^②。从粮食作物的品种看,仍是以粟、黍为主,水稻为辅,但分布范围更广,说明农作物种植的普及与推广。从磁山遗址出土灰化农作物的植硅体分析和大地湾出土的粮食作物籽实分析来看,在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粮食作物以黍为主,并有少数的粟,而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则发展为以粟为主要的作物品种。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一期(前仰韶文化)H398底部曾发现十字科的油菜遗存,西安半坡遗址的一座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屋内(F38)发现一满罐碳化的白菜或芥菜的籽实,说明中原地区最晚在仰韶文化早期已开始掌握蔬菜种植技术。仰韶文化的农业是逐步发展的,而且发展的态势是越来越好。例如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发现谷物碾磨器(包括碾磨石、棒、磨)56件,陶刀、石刀94件,分别是前仰韶文化发现谷物碾磨器(盘)1件的56倍,陶刀、石刀13件的8倍;仰韶文化晚期发现陶刀、石刀411件,是仰韶文化早期发现陶刀、石刀数量94件的4倍^③,可见仰韶文化晚期的农作物的收成好过仰韶文化早期,更是好过前仰韶文化时期。

粮食的剩余增加了粮食的储藏。西安半坡遗址的H15窖穴,发现碳化粟粒数斗,该窖穴容积为0.83立方米,换算成新鲜粟当有1000余斤^④。在仰韶文化的遗址中,这类窖穴往往是成群分布的,有学者统计,仅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陕县庙底沟三处遗址就发现窖穴800多个^⑤,考古发现中遗留满窖粮食虽仅是个例,但意义深远。因为它既确认了此类窖穴的储粮功能,也反映了当时粮食的生产量和储存量都有很大的规模。大量的粮食剩余也促使了储粮设施的进步,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出现袋状窖穴,且数量亦不断增加,这种窖穴口小底大,容量明显加大,可以储存更多的粮食。应该说,粮食的规模化生产为当时家庭饲养、手工业的发展以至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即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提供了条件。

在新石器文化中期,中原地区家禽家畜的饲养有了很大的发展,种类有猪、狗、鸡、羊、蚕

等。根据有关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在遗址中出土家养动物骨骼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野生动物的骨骼,如河南渑池班村遗址仰韶文化层的家养动物占84%,鹿科等野生动物仅占16%^⑥,说明家养动物已经取代狩猎,成为中原地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

(三)辽西、中原两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形态

1. 辽西地区

小河沿文化出土的磨制带孔石铲,应为掘土工具,但红山文化常见的石耜、双孔石刀以及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却消失不见,大量出现的是狩猎工具,如石片刀、骨柄石刀、石斧、三角形石镞、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片等,这一现象说明农业衰退,狩猎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的比重重新上升。内蒙古敖汉旗南台地遗址中房址灶边发现成堆的螺蛳、蚌壳及动物碎骨,证明当时人们食物以渔猎和采集品为主^⑦。导致农业衰退的原因是自然环境的恶化。古环境研究表明,距今5000~4000年间出现的全球气候转向干冷,曾使甘肃齐家文化遗址气温和降水突然下降,农业北界南移了1°^⑧。也使辽河流域出现一次明显的沙地扩张^⑨,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左右。干冷的气候既造成了农田毁坏、可耕地减少,又使谷物因低温冷害而歉收或绝收。例如赤峰地区,现年平均 $\geq 10^{\circ}\text{C}$ 积温2900~3200℃。若年平均气温下降3℃左右,就意味着 $\geq 10^{\circ}\text{C}$ 积温下降到2390~2700℃。温度下降3℃左右积温条件已临近北方春谷约需2000~2600℃积温的最下限,如果再考虑到史前谷子抗寒性不及现代谷子品种,那么可以进一步推测,温度下降3℃左右会使 $\geq 10^{\circ}\text{C}$ 积温无法满足谷子生长所需的积温。其结果是农业北界南移,赤峰地区以北的史前居民不能从事谷子生产,赤峰及其以南地区也因为低温冷害造成谷子歉收甚至绝收。所以干冷气候事件致使红山文化末期和小河沿文化时期的农业种植严重衰退,人口大举南移或西迁,聚落空间分布范围的北界由红山文化晚期的北纬44°南移至北纬42.5°^⑩。农业的衰退导致人口锐减,表现为遗址数量和分布密度锐减,如内蒙古东部地区聚落遗址从红山文化时期的800余处锐减到小河沿文化时期的100余处^⑪,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低谷。小河沿文化的动物群尚不清楚,南台地遗址H16发现一具狗骨架,可能与祭祀活动有

关, 是否属于家养动物, 尚无鉴定报告。

2. 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农业, 处在耜耕农业的繁荣阶段。其表现有: (1) 农业生产工具以耒耜、铲、锄、刀、镰为主, 虽仍为石、角、骨、蚌质, 但制作规范、精致。中原龙山文化晚期的某些遗址里, 如河南孟津小潘沟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现了犁形器。从孟津小潘沟的石犁使用痕迹分析, 这类石器不是做上下运动的锄、耜类工具, 而是器前端向下倾斜、沿水平方向运动的松土工具^⑤。我们以为, 尽管这种犁形器擦痕和磨蚀痕迹表明还不能深耕, 耕作效率较低, 但与锄、耜、铲等松土工具相比, 无疑是耕作技术的重大发明, 预示着一项了不起的变革——犁耕农业的出现。(2) 农作物以粟为主, 黍为辅, 其所占比例均相当高。例如襄汾陶寺遗址浮选出碳化农作物籽实 9799 粒, 计有粟 9160 粒, 黍 606 粒, 稻谷 30 粒, 大豆 3 粒, 粟、黍所占据比例高达 99.87%, 其中粟高达 93.47%^⑥。中原地区除了出土粟、黍、稻、大豆的籽实外, 还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和博爱西金城遗址浮选出小麦籽实^⑦, 可以这样认为, 这个时期以粟作为主, 开始普及稻作, 还从西亚传入了小麦, 从而使中原地区开始出现粟、黍、稻、小麦、大豆等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3) 水井和水渠的出现。人们利用水井水渠灌溉农田, 扩大了耕地面积, 增加了作物产量, 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自然水系江河湖泊的依赖, 为定居到更广阔的平原生活, 从事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4) 粮食生产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社会的基本需求, 而且被用于储藏。这时的窖穴结构多为袋状, 容量大, 可以储藏更多的粮食。山西侯马乔山底遗址两座袋形窖穴 (F₁、F₂) 中发现有储存的谷子, F₁ 谷子堆积范围直径为 2.4 米, F₂ 直径为 3.5 米, 中部堆积较厚, 约 30 厘米。初步测算 F₁ 容积在 25 立方米以上, F₂ 容积在 40 立方米以上^⑧。发达的原始农业为人口的繁衍生存、家禽家畜的饲养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中原龙山文化出土大量酒器也说明了当时酿酒业的发达, 而酒的生产规模, 直接取决于粮食剩余的程度。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原地区的家禽家畜种类有猪、狗、羊、牛、鸡、马, 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 其次是狗、牛、羊, 马和鸡的数量最少。

在这个时期, 家禽家畜的饲养具有两大特征: 其一是数量明显增加, 如陕县庙底沟遗址 26 个龙山文化早期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 大大超过同遗址仰韶文化 168 个灰坑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 其二是家养动物的比重已远远超过狩猎而占主要地位, 如渑池班村河南龙山文化早期, 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 83%, 鹿科等野生动物仅占 17%; 商县紫荆遗址陕西龙山文化, 猪等家养动物占全部动物总数的 76%, 鹿科等野生动物仅占 24%^⑨。

(四) 辽西、中原两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的比较

根据见于报导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资料, 综合分析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它是以采集、狩猎为主, 农业、畜牧业为辅的经济形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文化, 农业虽有极大的发展, 但认为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尚缺乏考古学确切证据。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自然环境的恶化, 导致了农业的衰退, 狩猎、采集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由于农业不发达, 没有什么剩余粮食, 使得家禽家畜的驯化和饲养受到极大的扼制, 所以该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畜牧业亦一直得不到发展, 而狩猎经济却比较发达, 捕猎野生动物一直是居民肉类食物的主要来源。辽西地区史前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一般比较瘠薄, 大概是由于追逐既利于农业生产, 又利于渔猎、采集的聚居之地而频繁迁徙的缘故。有学者指出: “中国的东北及其以北的地区纬度较高, 年平均气温偏低, 无霜期短, 不太可能成为农业的起源地。只是到较晚的时期才从华北传入农业, 也只是限于比较靠南的部分。所以在新石器时代和以后的一个时期内, 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相对滞后的。”^⑩

中原地区是我国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前仰韶文化时期, 原始农业、畜牧业, 就已不是最初的发展阶段, 其发达的农业经济使社会形成以农业、畜牧业为主, 狩猎、采集为辅的经济形态。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农业、畜牧业持续繁荣、发达, 在晚期更是出现了粟、黍、稻、麦、大豆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 猪、狗、羊、牛、鸡、马等多种家畜家禽的饲养, 也就是形成了古代文献所说“五谷”、“六畜”的农业经济格局。除了本文已列举的家畜饲养发达与狩猎衰退的对比数据之外, 碳 13 测

定古代人食谱结构的数据资料,也足以说明农业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据测定,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居民食谱中C4植物(粟、黍)的比重在逐渐增加,例如居住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的居民食谱中,C4植物的成分占了将近50%;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山西襄汾陶寺的居民食谱中C4植物的成分占了70%。而且猪的食谱中也有较多C4植物的成分,说明家猪的饲料中粟、黍或谷糠的数量也增多了。^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辽西地区,地处我国原始农业的北界,脆弱的生态环境致使农业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无论是早期、中期和晚期,其农业和畜牧业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有学者将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归入“渔猎型”东北文化区或经济文化区,而将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称为“农业型”的中原文化区或经济文化区,^②可见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存在极大的差异。这样的历史事实也正说明,在这一场“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的“新石器革命”中,辽西地区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由此,作为文明诞生的条件和基础,辽西地区远远不及中原地区扎实和丰厚。

二、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与仰韶文化的宫室建筑

(一) 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郊野祭祀建筑

从1983年开始,辽宁朝阳喀左县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相继发现了坛、庙、冢的遗迹,出土了包括红山女神头像、陶质塑像、彩陶、玉雕龙、大型玉人、玉凤等大批精美绝伦的文物,于是红山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学者提出了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以及玉葬之礼,反映出礼制在五千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这种反映礼制的大型礼仪性建筑,与文明起源的其他要素,如金属的发明、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形成相比,更具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所以,以红山文化坛庙冢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象征,是当之无愧的”^③。

伴随着文明起源、国家产生而出现,并在我

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宗教礼仪建筑,无论是祭坛,还是宗庙、社稷,祭祀天神、地神、祖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孙安康,均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这类建筑,都是农业经济的产物,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的宗教礼仪建筑也不例外。这种观点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例如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大型礼制建筑,“是以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社会财富有相当多的积累为其经济基础的”^④;“(东山嘴遗址)是一处由祭场、祭台、祭坛组成具有综合性、多功能、露天式的宗教礼仪活动场所,举行的祭天、祭地活动与农业密切相关。”“(牛河梁遗址)祭祀对象为天地、祖神、图腾保护神及农神,亦奠基于农业经济之上”;^⑤“牛河梁遗址应是一处融祭天地、祭神灵、祭祖灵于一体的宗教活动场所。辽西地区多山地丘陵,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通过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祈求雨量充沛,确保农业生产的丰收,就是红山文化先民的主要用意。”^⑥等等。

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认为,伴随着文明起源、国家产生而出现的龙崇拜,也是农业经济的产物,如认为龙的起源,“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⑦;“龙起源于二十八宿的东宫星宿,而龙的崇拜则源于古人观测东方星宿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观象活动”;^⑧“华夏上古龙崇拜源于原始历法的龙星记时制度,龙的原型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群星。龙星周天运行,春、夏、秋、冬四时分居东、西、南、北四方,正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而成为古人了解时间与岁时的主要依据,并成为天道自然的体现,成为古人万民共瞻的神圣象征……龙星之被命名为‘龙’(虫)则与龙星被作为昆虫惊蛰的标志有关。”^⑨也有学者认为,龙崇拜是原始农业出现后以水为主题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⑩。

唯物史观认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⑪。我们认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包括红山文化玉雕龙和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冢在内的“前龙纹”和宗教礼仪建筑的出现,都是史前华夏民族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是以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如果说,在红山文化晚期的农业经济状况

下,尚能出现如此宏大的宗教礼仪建筑的话,那么在农业经济更加发达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宗教礼仪建筑更应该出现。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在我国中原地区,距今约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祭祀高山大川,即祭天礼地的活动,这种祭祀活动经夏禹、商汤、秦皇、汉武,一直延续了数千年。现辑录文献记载中有关黄帝至虞舜时期祭祀天地的活动如下: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多为焉。”[索隐]:“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王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多,犹大也”;

《史记·孝武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

《史记·封禅书》:“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禹遵之”;

《竹书纪年》:“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黄帝)祭于洛水”;

《艺文类聚·祥瑞部·鱼》:“《帝王世纪》曰:‘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②;

《水经注·洛水》:“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即沉。……舜又习尧礼”;

《太平御览·龟》:“《尚书·中侯》曰:‘尧沉璧于洛,元龟负书出,背甲赤文朱字上坛,沉璧于河,黑龟出赤文题。’”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在黄帝至虞舜时期,祭祀高山主要是祭祀我国的名山“五岳”,即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祭祀大川主要是祭祀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及其支流洛水。他们在祭祀场所修筑“坛”,以“璇玑、玉衡”、“五瑞”、“璧”等玉器,牛、羊、豕、犬、鸡等“五牲”为祭品,举行焚柴告天、望祭山川、沉璧于河(洛)的礼仪,来祭祀他们心目中的“群神”,如“上帝”、“六宗”(主管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七政”(主管日、月、五星)以及“鬼神”(人神)和“大鱼”(龙神)等等。此外,自舜开始还制订了“五载一巡狩”名山的制度,定期祭祀以与群神沟通。

尽管中原地区尚未发现仰韶时期,即距今5000年前的祭坛之类的郊野宗教礼仪建筑遗存,但考古没有发现并不等于历史上就不曾存在。根据上述文献记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我们相信,在农业经济更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一定存在祭坛之类的郊野宗教礼仪建筑。

应该认为,宗教礼仪建筑是在宗教思想、宗教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根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中原地区不仅有宗教礼仪建筑,更是形成了以祭祀礼仪为核心的治国教民的理论和制度,这就是所谓的礼制。《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记·礼运》:“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圣人则天之明,国地之利,取法度于鬼神,以制礼。”[疏]:“圣人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礼,本谓制礼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庙、祭山川,一则报其礼之所来之功,二则教民报上之义。”据现代学者研究,礼制大概发端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流域,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③。礼制自出现之后便深深地扎根于中原地区,以致形成文章典籍,为后世所传承。文献记载虞舜之时就“修五礼”、“典朕三礼”(《尚书·舜典》),从此开始“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礼记正义·曲礼》)虞礼在夏代发展为夏礼,商代继承并发展了夏礼形成殷礼,周代继承了殷礼发展为周礼,所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二)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宫室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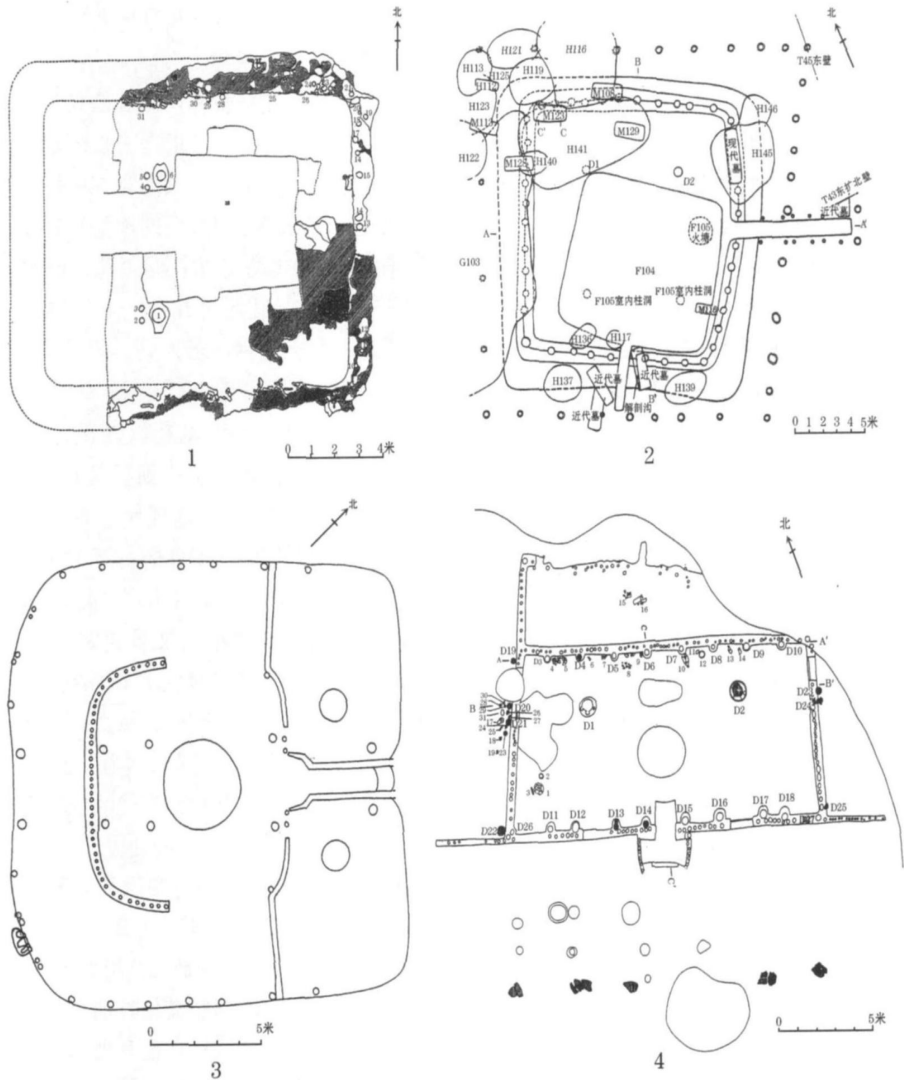
作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存在礼仪建筑的支持,不仅有文献资料,更有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其中最重要的要数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5000年前的大型建筑基址。

位于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县的西坡遗址，属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 6000 ~ 5600年）遗址，横跨西坡、许家、南涧、北涧 4 个自然村，现存面积 40万平方米。从 1999年开始，西坡遗址连续发现房址、壕沟、蓄水池、墓地，其中大型房址、墓地中的大墓葬以及出土玉钺、玉环等玉石葬品，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在遗址中发现房址有中型和大型者。中型房址多座，房基整体占地面积均达到 90平方米以上，其中如 F102 占地面积约 98平方米，F104 占地面积达 120余平方米。大型房址两座，位于遗址中心区域，其中房址 F105 主室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弧角正方形，面积 372平方米，主室室内面积 204平方米，外有回廊和长条形斜坡门道，总占地面积 516平方米；房基夯土层面、房间的居

住面、墙面夯土的垫土表面，均刷抹泥浆并用红色辰砂（H8S）涂抹。专家推测此屋为重檐四面坡式方锥体屋顶建筑（图一，2）。房址 F106 室内面积达 240平方米，居住面下有多层铺垫，地面和墙壁以朱砂涂成红色^⑤。

这两座大型房址是目前发现的庙底沟类型最大的单体房屋建筑遗迹，其建筑规模宏大、技术复杂、位置特殊，均显示它不是一般的居住址，发掘者认为是“一处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很可能具有原始殿堂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地和墙都涂了红颜色，显然不是一般老百姓居住的，应该是有某种礼仪的或者祭祀的、或者宗教的意义在里面”^⑥。

考古学家在渭河上游清水河畔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了大地湾四期（距今 5500 ~ 4900



图一 仰韶文化出土“大房址”例举

1. 陕西西安半坡 F1 2 河南灵宝西坡 F105 3 甘肃秦安大地湾 F400 4 甘肃秦安大地湾 F901

年),即仰韶文化晚期的3座多间复合式大型地面建筑。F400房址,近方形,复原面积在260平方米以上,门道左右两侧有两套间,室内中部偏后位置有一屏风式内墙,屏风前可能设大灶台,屏风后设取暖壁炉,推测为部落公共活动场所(图一,3);F405房址,长方形,面积230平方米,室内面积150平方米,主室两侧出现两廊(侧室),内室前部正中设大灶台,后部左右两侧有顶梁大柱。发掘者认为属“四坡顶重檐式建筑”,“应是夏商时代‘四阿双重屋’宫殿建筑的前身”;F901房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以长方形主室为中心,两侧为侧室,主室后设后室,房前有附属建筑,主室前部正中设大灶台,后部左右两侧有顶梁大柱。其“复杂的建筑结构显示出它不是一般的生活用房,即使作为首领的生活住宅也是不适当和不方便的……它应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⑤(图一,4)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记录了他参观F901房址时的感受:“我们从中门进去,迎面便是一座比双人床还要高大的巨型火塘,火塘两边各有一根直径达90厘米粗(木柱直径50厘米,外包草泥和灰浆)的顶梁大柱。那火塘显然不像是一般居室中主要用于炊事也兼作取暖的火塘或灶,而可能是举行大型祭典或公共议事会时燃烧圣火的场所。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那在当年该是多么气派、庄严而神圣的处所,称之为原始殿堂应该是很贴切的。”^⑥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遗址的布局,“聚落主体坐落在背山面河的山坡上,两侧以沟壑为天然屏障,山坡中部为大型原始殿堂式建筑作为公共活动中心,周围分布着数个房址密集的居住区,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⑦。严文明先生认为:“整个(仰韶文化晚期)聚落就好像是以F901为中心,或者以F901至F405为中轴线的分层次和分等级的有序结构。”^⑧

根据古代文献,上古时期统治集团上层(酋长、帝王)日常生活、治事、飧食、祭祀的建筑称为“宫室”、“世室”、“明堂”、“重屋”、“台”等,所谓“天子居明堂”(《礼记·月令》)、“朝诸侯于明堂”(《礼记·明堂位》)、“明堂者,天子大庙”(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等等。宫室的建筑特点,其一是高大,其二是四阿重檐。《考工记·匠人》:“殷人重屋,

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郑玄注:“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广九寻,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寻。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复竿也。”根据灵宝西坡遗址和秦安大地湾遗址大型房址的特殊位置、建筑面积以及重檐四面坡式屋顶(四阿重檐)、前堂后室(前朝后寝)等建筑特点,我们以为,灵宝西坡遗址和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大型房址都应该属于统治集团上层(酋长、帝王)的宫室建筑。

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代宫室建筑群,规模宏大,中轴对称,外有宫城墙拱卫,形成面积达10.8万平方米的宫城,在使用功能上已出现朝、寝、庙、社的分工,显示“左社稷右宗庙”的布局特点,已不是我国宫室建筑的原始阶段。古代学者对上古宫室的起源有过研究,如清代戴震在《明堂考》中指出:“王者而后有明堂,其制盖起于远古,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应,异名同实。”东汉学者认为宫室建筑起源于黄帝:“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事物纪原·宫》)根据考古发现,上古时期宫室建筑完全可以追溯到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灵宝西坡遗址的大型房址,可能还是集朝、庙、社为一体的宫室建筑,而秦安大地湾遗址则可能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在遗址中轴线上建成F901、F405、F400等大型建筑,形成宫室建筑群^⑨。它们都是夏、商、周宫室建筑的雏形。有学者认为:“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前堂后室’的大型建筑,它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是‘四阿重屋’。谁也不敢相信,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然出现在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⑩偃师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主殿夯土台基面积900平方米,二号宫殿主殿夯土台基面积412.5平方米;偃师商城四号宫殿正殿基址面积430平方米,五号宫殿正殿基址面积788平方米;灵宝西坡遗址F105面积516平方米,F106室内面积240平方米;秦安大地湾遗址F400房址面积260平方米,F405房址面积270平方米,F901占地面积420平方米。相比之下,较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的宫殿还要早1000多年的灵宝西坡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宫室建筑,也不能言其为小。从其建筑规模的宏大,技术的复杂程度来分析,中原地区上古时期的宫室建筑

的源头,恐怕还可能追溯到更早一些时候。例如著名古建筑学家杨鸿勋先生就曾指出:“(大地湾遗址) F901正可印证夏后氏‘世室’(含义即大房子)的传说,‘世室’这一复合体的大房子,从形式上讲是‘前堂后室’;从功能上讲是‘前朝后寝’。F901——世室,奠定了中国宫殿制度的基本格局;上溯其源,它正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见的比较简单的‘前堂后室’的‘大房子’——F1,一脉相承。”^⑩(图一,1)

(三) 中原地区的史前古国

西坡遗址位于灵宝铸鼎原,以铸鼎原为核心分布有71处仰韶文化遗址,加上陕县的34处仰韶文化遗址,共有105处,总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米。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把这些遗址统称为“铸鼎原仰韶聚落群团”。他参考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印第安人部落组合情况,推测铸鼎原聚落群有1300多个氏族,87个部落,共26万多人口。他认为,“这些部落具有共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可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区域民族的条件。能够统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部落,这么多氏族,这么多的人口,如果不是一个酋邦国家,任何部落是统治不了的”^⑪。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北达河套,南到江汉北部,西至洮河,东抵郑州附近,区域广阔。西坡遗址聚落面积广大,其墓葬反映了当时贫富的分化、阶级的萌芽。宫室建筑的发现,展示了当时统治整个酋邦的权力机构和统一整个酋邦思想的宗教礼仪制度的存在。不可否认,西坡遗址的聚落层次已发展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如果说“牛河梁的位置恰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聚落层次性已发展到形成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那就是古国出现的重大标志”^⑫的话,那么,位于庙底沟类型中心区域的西坡遗址,其聚落层次也属于最高层次中心聚落,同样也标志着中原仰韶文化核心地区最迟在距今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即早于红山文化晚期,就出现了古国。

大地湾遗址第四期聚落(仰韶文化晚期),其规模和某些建筑的规格都远远超出了仰韶文化早期和仰韶文化中期,也超出了周围同时期的聚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层次中心聚落,这说明中原文化区西部边缘地区,最迟是在距今5500~4900年前出现古国。大地湾遗址考古报告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地湾四期聚落的宏大气势,

显示出大地湾极有可能成为清水河沿岸的中心遗址,它已逐渐脱离史前聚落的巢臼,孕育着更高级的文明因素。或许将之视为城址的前身更为妥当,它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正处在向文明社会转折过渡的重要阶段。”^⑬

灵宝西坡遗址和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宫室建筑,以及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距今5300~4800年),佐之以文献记载,例如:“(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封之居七千”(《史记·封禅书》),说明我国中原地区在5000年以前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众多的古国。

在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之前,就存在国,即古国,也就是我们现在许多学者所常说的“酋邦”。《说文解字》:“国,邦也。”指的是国的源头邦国、古国。如果谈到国的标志,在我国古代,比起祭坛之类的郊外祭祀场所,宫室建筑更具国的象征意义,例如宫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社稷)。社(社稷)是祭祀土神、谷神的场所,文献记载我国夏代就有社,称为“夏社”。“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偏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白虎通义·社稷》)由于土地与疆域相关,“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周礼·小司徒》),又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兴亡,“王者诸侯必有诚社,何?示有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恶者失之。故《春秋公羊传》曰‘亡国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丧国之社屋之’,自言与天地绝也”。(《白虎通义·社稷》)所以社神攸关国祚、政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神祇,所谓“国中之神莫贵于社”(《礼记·郊特牲》郑玄注)。在上古时期,社既是祭祀之所,又是行政事之所,凡国有大事,如建邦立国、兴师征战、兵寇天灾、镇压叛逆等等,都必须祭告于社。“建邦国,先告后土”(《周礼·大祝》);“若大师,则师有司而立军社”(《周礼·小宗伯》);“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周礼·大祝》);“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史记·夏本记》)。于是在古代文献中,除了把土神、谷神以及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称为“社稷”之外,又用“社稷”代表国家。例如:“夫兵者,国家之大事,社稷之安危,生民

之性命所系”^⑥；“事有关于国家社稷，至重至大者”^⑦；“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国家社稷永享无穷之福矣。”^⑧所以我们认为，灵宝西坡遗址和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作为宫室——我国古代宗教礼仪制度的核心建筑，国家政权的象征，其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决不逊色于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宗教礼仪建筑。

三、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源与流

从二三百萬年前开始至约一萬年前结束的旧石器时代，是人类的幼年时代，经济生活处于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阶段，社会发展相当于原始群和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从一萬年前，人类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制陶、纺织的发明，逐渐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进入了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人类走出洞穴，开始在丘陵和平原的湖滨河畔，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状况，决定了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即决定了与这个社会相应的经济基础；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的母系氏族制度，是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恩格斯指出：“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情感、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地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⑩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农业、畜牧业，是史前社会生产力的伟大革命，在现今考古学文献中被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或有称为“农业革命”的，它的出现与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是说，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与发展，以及由于食物有了剩余而随之出现的人口的增加^⑪，使“全盛时

期的氏族制度”（母系氏族制度）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生产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的“前提”，亦即摧毁了母系氏族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必然要导致母系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成员间“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的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以与不断发展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相适应。我们认为，这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其始点就是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即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其终点就是氏族制度的崩溃，阶级社会的诞生。按照恩格斯概括的摩尔根分期法^⑫，这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就发生在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野蛮时代”，而且应该贯穿野蛮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野蛮时代的历史功绩就是结束了人类数百万年“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开创了人类“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文明时代”。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相对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来说，生产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具有暂时的和历史的性质。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可能立刻、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所以上层建筑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新石器时代，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转变，以适应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同样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过这个转变何时发生，以及转变与适应过程所需时间或长或短，首先是由其农业经济的出现以及发展状况决定的。若原始农业出现早些，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转变发生的时间则可能早些，反之则晚些；若原始农业发展迅速，其转变与适应过程所需的时间则可能短些，反之，则漫长些。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认为，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出现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大概在前仰韶文化晚期与仰韶文化早期的交替时期，已处于父系氏族制度的发展阶段。

（一）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脉络

前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原始农业、畜牧业又使中原地区出现了原始农业聚落，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有研究者认为，前仰韶文化时期男女在劳动分工上已发生变化，“男

子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妇女主要从事粮食加工和制备饮食的家务劳动”，“男子在农业生产上已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在生产上占居主导地位，妇女已失去了生产职能”^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男女在生产上地位的变化导致了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出现私有财富，贫富分化，以及氏族成员的等级差别^④。这些变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与墓葬中已有所反映，如舞阳贾湖聚落遗址（约距今 9000 ~ 7800 年），发现房址 45 座，其中大型房址（居住面积 20 ~ 40 平方米）4 座、中型房址（居住面积 10 ~ 20 平方米）10 座，小型房址（居住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31 座，其比数为 4 : 10 : 31（一期为 3 : 5 : 8 二期为 0 : 1 : 13 三期为 1 : 5 : 10）^⑤；秦安大地湾一期聚落遗址（约距今 7800 ~ 7300 年），发现的 4 座圆形小屋，居住面积均约为 6 ~ 7 平方米，另有一座（H398）面积约 10 余平方米，出土遗物较多，推测房主人为氏族重要成员^⑥。在 20 世纪 90 年代，考古学家李友谋先生根据裴李岗文化墓葬葬式、葬俗的发展变化，提出中原地区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就发生了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变革，他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氏族制的变革是从母系转为父系。引起母系向父系转变的重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男女劳动分工所发生的变化”，“（裴李岗文化）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人们已经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男女两性间的劳动，亦有了分工的侧重，男子是农业和渔猎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妇女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而且在氏族内部也出现了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这一变化，就使男子占居经济生产的主导地位。随着男子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他们在氏族内的权力和地位就日益提高，妇女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缩小，她们在氏族内的权力和地位就每况愈下，最终就导致地位和权力的转移”^⑦。

恩格斯是这样来叙述从母权制到父权制这场激进的社会革命的，他说：“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时，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象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

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继承权。”^⑧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意义深远。从长远的历史意义讲，“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⑨；从当时的现实意义来讲，私有财富、父权制的出现意味着氏族制度瓦解的开始，“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它（氏族制度）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之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⑩

有文献记载，我国古代父系氏族制度取代母系氏族制度的社会变革，发生在伏牺氏时代^⑪，在时间上大体与前仰韶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早期相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诔诔，起之吁吁，饥之求食，饱之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牺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以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故谓之伏牺也”（《白虎通义·号》）；“先圣（伏牺）仰观天下，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语·道基》）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出现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个繁盛期中最强盛、最繁荣的区域文化——仰韶文化。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不仅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还有发达的纺织业、制陶业、制玉石业、制骨业、建筑业、酿酒业，此外还出现了冶铜业，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最为发达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仰韶文化发达的经济，促进了

文化与艺术的繁荣,根据考古发现,当时中原地区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物理、化学、数学、医学、音乐知识,出现了彩绘、雕塑艺术,产生了图腾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祭天礼地的宗教仪式,还出现了原始文字、宫室等礼仪建筑^⑧。此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父系氏族制度,必然促使中原地区仰韶时期的社会结构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贫富差距、等级差别明显扩大,这种现象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郑州大河村和秦安大地湾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都有反映。例如西安半坡聚落遗址(约距今6800~6300年),房址按面积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房址居住面积10~20平方米,中型房址居住面积30~40平方米,大型房址居住面积超过40平方米,最大的复原面积约160平方米。发现的房址以中小型、尤以小型者居多,根据发掘报告,发现房址46座,其中超过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1座,位于聚落中心位置,系氏族首领住宅,小型房址不少于37座,最小者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⑨;秦安大地湾二期聚落遗址(距今6500~5900年),以I、II段房址为例,按面积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居住面积超过56平方米,中型居住面积在25~56平方米之间,小型居住面积小于25平方米;按功能大致可分为4个等级。A等级:大型房址,系首领住宅兼公共活动中心,也是最高级的房址;B等级:中型房址中面积较大者,有的内部结构与大型房址相同,可能是首领或大家族族长的住宅;C等级:其他中型房址,大家族家长居室;D等级:小型房址,数量最多,为一般氏族成员居室。它们之间的比数,仅按已经发掘且保存完整者计算,I段为1:1:8:14,II段为1:2:9:41。及至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更是出现了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发掘者认为这四个等级“不仅在面积大小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建筑形制乃至细部结构上有显著不同,同时在出土遗物上也有着多少和精美程度的差别,这表明大、中、小房址功能的不同,并进一步折射出聚落内部成员存在等级上的高低之分”^⑩。

考古发现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的墓地中出现大型、中型、小型墓葬以及出

土玉钺、玉环等玉石器,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的分化,氏族成员间等级的发生^⑪。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更是得以发展,形成了“五谷”、“六畜”的农业经济格局;手工业亦在不断发展,其中青铜冶铸技术的出现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基本条件之一。这时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明显,等级差别日趋森严。河南孟津妯娌龙山文化早期保存比较完整的墓地里发现55座墓葬,除一座合葬,4座无人骨架外,50座为单人葬,其中大型墓1座,中型墓7座,小型墓42座,其1:7:42的比数“表明氏族成员间已划分为等级,出现了金字塔式的社会框架”^⑫。

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地发现的墓葬,大型墓9座,中型墓80座,小型墓610座,分别占墓葬总数的1.3%弱、11%强、87%以上。小型墓无葬具,有的仅以植物茎秆编成的帘箔卷尸;大多无随葬品,仅10%弱的墓葬有随葬品,一般不超过三件,而以骨笄为常见。中型墓发现木棺痕迹,大多有随葬品,通常一二件至五六件,至多十数件,以玉、石器为主。大型墓有棺无槨,随葬品十分丰富,多者近200件,一般亦有近百件,不仅有彩绘陶器、彩绘木(漆)器等水平高超的工艺品,而且有显示墓主人特殊身份及地位的玉钺、石钺和龙盘、鼉鼓、特磬等礼乐重器。研究者认为,陶寺墓地“大、中、小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恰是当时部落内部社会结构的形象写照。贫富分化、等级贵贱、阶级对立,在这里已可一览无余”。此外研究者还注意到,“大型或中型墓成段成组排列反映了世袭制已经出现”;“M2001(大型墓)两侧的中型墓,死者分别是25岁和35~40岁的女性,从墓位上判断,应是大墓墓主的妻、妾。这种一夫多妻的并穴,在整个墓地中很特殊。在广大氏族成员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同时,个别部落显贵拥有多妻的特权。”^⑬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开始,氏族内部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贫富分化日趋扩大;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社会财富已开始被大量聚敛到少数人手里,以致有学者提出“私有制在陶寺文化早期已经确立”^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私有制度在中原地

区萌芽、发展的全过程。而在它整个发展过程中,对个人财富的追逐成为社会的风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为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正是这种“对财富的贪婪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最终摧毁了氏族制度,开创了文明时代。“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⑧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⑨

综合考古发现,我们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就形成了农业经济发达、文化同根同源的强盛酋邦古国。考古发现的大型墓葬、宫室建筑、城址,文献记载自黄帝开始的军队、职官、法典、礼仪,都意味着私有财富、等级差别的出现,社会权力雏形的形成和国家的萌芽;虞舜和夏禹又将自己统治的疆域分别划分为十二个州与九个州,意味着开始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在论及国家起源时提出的国家有别于氏族组织的特征:“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⑩。这两个特征中原地区相继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

通过以上分析,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发达的农业经济为氏族制度的瓦解、奴隶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扎实的经济基础;氏族制度的瓦解来自于氏族内部私有财富的产生、贫富分化的出现和发展;从前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开始,中原地区随着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等级差别的日益扩大,氏族社会内部的结构亦在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就是奴隶制社会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逐渐形成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指出:“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⑪;“在每一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⑫。阶级与阶级斗争产

生了,阶级社会也随之要出现。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当时可能处于军事民主制的阶段,但也有可能已经冲决氏族制度的躯壳,进入了阶级社会”^⑬。与此同时,为了解决由于贫富不均而引起的种种社会纠纷与矛盾,一个以保护私有财富为宗旨的公共权力机构——国家,也逐渐由氏族内部的管理机构蜕变而成。恩格斯指出:这个“被发明出来的”国家,“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⑭。

陶寺遗址是一处占地超过3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考古学家在遗址上发现了占地56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和占地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还在早期城址的中南部发现了约5万平方米的早期和中期的宫殿区,发现了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 and 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以及由部落显贵所独占的仓储建筑。有学者认为陶寺中期城址“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其形制规整,城内布局规划明确,等级差别森严,都是史前城址所罕见的。陶寺城址的社会形态和文明程度呼之欲出”。此外他还根据考古发现的遗迹,认为在陶寺中晚期之交,“手工业者侵占了原来的宫殿区”,发生了“扰大墓、毁宫殿、废城垣、砍头惨杀等一系列野蛮残酷的行为”,提出这场“无法确定是由外族入侵所引起的大动荡”,“是否意味着突破血缘关系的阶级矛盾所引起的暴力冲突和‘政治报复’的行为?假如陶寺文化晚期席卷陶寺遗址的疾风骤雨确系尖锐的阶级对立所导致,那么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形态便显露出冰山一角,它将是早于二里头文化夏王朝的最早国家”^⑮。

龙山文化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和青铜工具的使用,文字的出现,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鄆城郝家台、安阳后岗、辉县孟庄等城址的发现,已经使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国家的雏形已经形成,至少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陶寺城址和墓地的考古发现,

尤其是陶寺遗址考古遗迹所反映的史前那起非外族入侵的暴力冲突，更使我们认识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出现国家，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了。因为这时的中原地区，正处在恩格斯所指出的国家必然产生的历史阶段：“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之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人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⑧

作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奴隶制国家的佐证，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址里往往发现奴隶的遗骸。例如在河南安阳后岗、汤阴白营和登封王城岗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用人作奠基牺牲的遗迹。后岗遗址在发掘面积仅 6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 26 个儿童作为房屋奠基的牺牲，有学者认为，“用人作为建筑物的牺牲，这是奴隶制出现的残酷现象，这些奠基的死者只能是奴隶或奴隶的子女”。又如在河南淅川下王岗、洛阳姙李、临汝煤山、孟津小潘沟、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文化遗址的灰坑里，发现非正常死亡人的遗骸，他们或被捆绑活埋，或身首异处，或腰斩致死，被抛尸在废弃的灰坑中，或与兽埋在一起，这些死者社会地位低下，当为奴隶。这些现象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发生了“由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向有剥削、有压迫的奴隶制社会的质的变化”，“当是龙山文化已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个有力证据”^⑨。

据研究已有二十六七个地点发现这类死者遗迹，关于这些遗存的性质，颇有争论，近年论者多倾向于其中一些“是被杀的外族俘虏”^⑩。关于这些死者，我们的确无法去辨识他们的确切身份，其死前究竟是奴隶还是“被杀的外族俘虏”，但我们认为，姑且是外族俘虏，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确确实实存在有别于氏族成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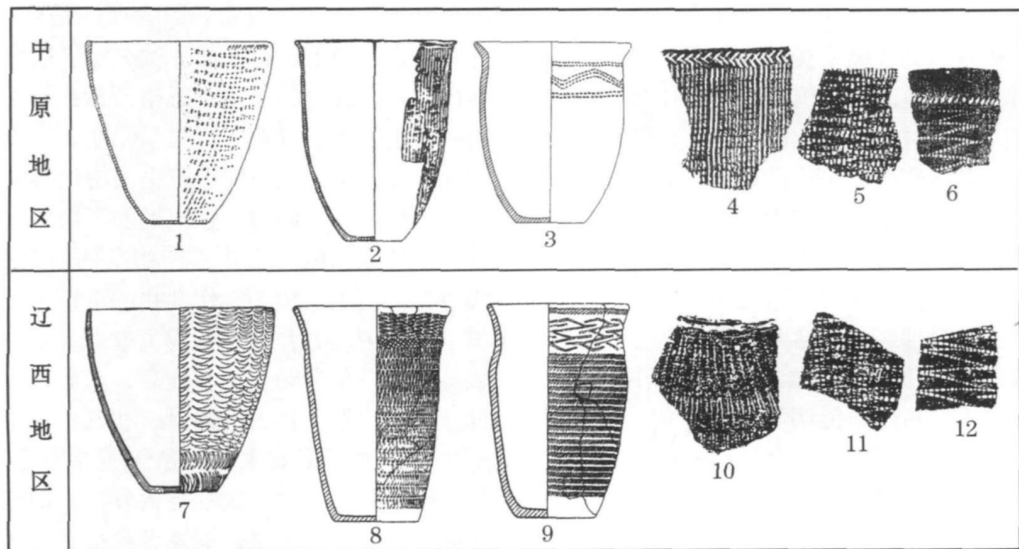
社会群体，这就是奴隶。因为即便是外族俘虏，这些人自被俘虏那天起，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或被杀死，或沦为奴隶。恩格斯指出：“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产生出超过维持劳动人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人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⑪

总而言之，中原地区从 8000 ~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等级差别，母系氏族制度逐渐向父系氏族制度过渡，而正是私有财富最终导致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和私有制度的建立；而大概在距今 5500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随着宫室、城址等文明要素的产生，出现了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真正开始了从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而大概在距今 4300 ~ 3900 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国家，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由此，中原地区走完了文明起源的整个历史过程。

（二）中原地区古文化对辽西地区古文化的影响

年代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分布区域狭窄，农业经济落后，应该是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文化。尽管辽西地区有其独具特征的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但是不可否认，它一直受到了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原古文化就开始对辽西古文化施加影响，如 7000 年前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筒形罐和篦纹（压印纹），竟然在 1 万年前中原地区新密李家沟遗址的“直口桶形罐”和“绳纹”（实即压印纹）中找到它的祖型；7000 年前兴隆洼文化以黍为主，粟为辅的粟作农业，竟然与 7500 年前中原地区前仰韶文化的粟作农业结构一致，等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的“之”字压印纹筒形罐，是红山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因素。主张北



图二 中原地区与辽西地区出土篾纹及篾纹陶器例举

1. 河南密县莪沟 H17 :4 2 4 6. 河南陕县水泉 H10 :6 H9 H59 3. 河南辉县孟庄 H132 :9
5. 河南汝州中山寨 H20 7. 内蒙古赤峰西水泉 F13 :10 8 9. 辽宁阜新查海 F5 :1 F6 :1
10. 内蒙古赤峰水泉 11 12. 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

(资料来源《考古学集刊》第1辑;《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1995年第1期;

《文物》1994年第11期;《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辉县孟庄》。)

方地区为文明起源“原生型”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之”字压印纹制陶工艺,确切地说在中原古文化中没有找到最早的线索,从而提出了“源于北方的红山诸文化”的假说。但中原地区新密李家沟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裴李岗文化的某些篾纹陶器,例如河南密县莪沟、辉县孟庄、陕县水泉、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深腹篾纹罐,筒形篾纹罐等等,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筒形罐和压印纹制陶工艺还应该是源自中原地区古文化(图二)。其实早在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先生就指出,裴李岗和磁山陶器上的篾点纹,“这种纹饰曾被称为弧形纹或‘之’字形纹……一般的发现限于辽宁西部,如锦西沙锅屯、赤峰红山和巴林左旗富河沟门等地都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莪沟还复原了两种大口深腹小平底瓮,其形制与红山、富河沟门等地的器形完全一致。这些迹象可能说明中原和东北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⑩。2006年更有学者对篾纹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篾纹渊源当是裴李岗文化”,辽西地区出土的篾纹,“其竖行、横行弧线篾点‘之’字纹,有的与裴李岗文化中的如出一辙,其时代比裴李岗晚1000年,这充分说明它是通过磁山、上宅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⑪。

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对辽西地区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例如:有学者认为赵宝沟文化陶器中的红陶钵以及几何形纹和动物形纹的施纹风格,是接受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并进一步认为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吸收了来自南部中原考古学文化的部分营养而形成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⑫;“从多方面考察,裴李岗文化对赵宝沟文化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是无疑的”^⑬。在红山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是强烈。“由于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某些因素的注入,致使红山文化势力迅速膨胀。”^⑭如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某些陶器,“早期近(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后期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⑮,“磁山遗址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从陶器的器形、纹饰和石器等方面,两者极为相似……这说明我国东北的红山文化,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⑯;在住房形态上,红山文化时期居住面积小型化,兴隆洼文化时期独具辽西地区特征的大型方形竖穴式房屋逐渐消失,而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流行小型房屋,夯土筑墙、土坯砌墙以及使用白灰面,与中原龙山文化房屋共同的特征突显出来。这个过程有学者称之为“住房形态上的中原化”^⑰;此外尤其不能低估的是中原地区农业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

原地区发达的农耕文化开始对辽西地区产生影响,成为推动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随着红山文化农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使当时人获得了较稳定的食物来源,缓解了人口增长造成的压力,同时也促进了建筑、制陶、玉雕、泥塑、冶铜等行业的兴起,使一批人走上了专业化生产的道路”^[10]。

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中原文化对辽西地区的渗透和影响都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倘若没有中原文化的影响,红山文化就不可能有如此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无怪乎有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向东北发展的地方支系”^[11]。

红山文化接受仰韶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也反映在精神文化方面。辽宁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和辽宁建平牛河梁坛、庙、冢遗址,显然是接受了仰韶文化宗教礼仪建筑的影响而出现的。理由有三:

1. 宗教礼仪建筑源于宗教思想。唯物史观认为,宗教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它是在最原始的人们对自己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极愚昧、极模糊、极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最终形成一种更高级的思想体系,即更加离开物质经济基础的思想体系,成为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12];唯物史观还认为,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人们头脑中发生的思想过程,决定着宗教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犹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3]。由此我们认为,我国上古时期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的出现,是原始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研究认为,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农耕两种优势因素的同步传入,促使辽西地区的农业,自红山文化第三期开始,发生了极大发展,彻底改变了该地区以往以狩猎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局面^[14]。综合分析红山文化经济形态,我们认为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一、二期的农业经济,不仅远远不及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恐怕连新石器早期的前仰韶文化也不如。可以肯定地说,倘若不是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辽西地区本土文化的农业经济状况,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中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期都没有出现过的宗

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换言之,排除外来文化影响,红山文化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宗教礼仪建筑所表现的宗教思想,超越了辽西地区本土文化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2. 有学者在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区系时提出“以筒形罐为代表、渔猎型的东北文化区,以罐一鬲为代表、粟作农业型的中原文化区和以鼎为代表、稻作农业型的东南沿海文化区等三大考古文化区或三大经济文化区”,并认为红山文化“以筒形罐和渔猎经济为自身特征,它与仰韶文化的关系是渔猎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结合”^[15]。这里就有一个不能回避的、必须是追根问底的问题,红山文化中的坛庙冢宗教礼仪建筑,作为农业经济的产物,它到底是源自渔猎文化的东北文化区,还是来自农业文化的中原文化区?毋庸置疑,答案只有一个,它只能源于农业文化的中原文化区。

3. 作为红山文化宗教礼仪建筑源于中原文化区农业文化的考古学证据有二,其一是仰韶文化出现宗教礼仪建筑较红山文化为早。据考古发掘报告,辽宁东山嘴遗址“石砌建筑基址的年代,应在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前后。石建筑基址的C14测定年代为 4895 ± 70 年(树轮校正为 5485 ± 100 年)”^[16],辽宁牛河梁遗址“在测定的碳十四数据中,较早的有J1B距今 4975 ± 85 年,树轮校正 5580 ± 110 年,较晚的有Z4距今 4995 ± 110 年,树轮校正 5000 ± 130 年。可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延续了五百年左右”^[17]。而仰韶文化灵宝西坡遗址,“F105大致相当于该遗址庙底沟类型遗存的第一段或略早。一般认为,庙底沟类型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500年,则F105的年代应在距今5500年以前”^[18]。也就是说,红山文化宗教礼仪建筑出现的年代距今5500~5000年(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牛河梁遗址和东山嘴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19]),而仰韶文化宗教礼仪建筑出现的年代则在距今5500年以前,这说明中原文化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传入辽西地区,具备时间条件。其二是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中“还出有具庙底沟类型特征的彩陶器”^[20]。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出土具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宗教礼仪思想及其建筑传入辽西地区,具备空间条件。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原仰韶文化

的宫室建筑和文献记载的郊野祭祀山川的宗教礼仪建筑（尽管目前尚未被发现），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郊野坛庙宗教礼仪建筑的源头。或者说，中原地区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紧随仰韶农耕文化的传入而进入辽西地区，于是出现了牛河梁和东山嘴坛庙宗教礼仪建筑。

（三）中原地区与辽西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历史地位

有学者为我国文明起源中心的转移勾勒出一个路线图。他认为：“源于渭水流域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与源于大凌河流域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在距今6000年前各自从自己祖先衍生或裂变出优生支系，它们在河北北部的桑干河上游相遇，在大凌河流域重合，产生了以坛庙冢为象征的文明火花，又南下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在晋南与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形成‘中国’本土的基础。”^⑩

这就是对所谓北方地区为文明起源原生型，中原地区为文明起源次生型的最具体的注释。

本文业已讨论过中原地区古文化在辽西地区古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如上所述，中原地区与辽西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有了文化的交流，而根本不是在红山文化时期才出现文化的相遇与撞击；长期以来，辽西地区本土文化是在吸取中原地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宗教）文化中不断发展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建筑，只是接受中原文化宗教思想和宗教礼仪建筑影响的结果，属于舶来品，并不是文化“撞击”后创造出来的、高于中原地区发展水平的“新的文明火花”。我们认为史前各文化区系间的交互关系，是在长期交往中互相影响、吸收和文化的融合，这种互相影响和吸收更多地表现为：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对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先进文化的吸收，以及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文化传播、渗透和影响。有学者指出：“考古学以往发现揭示的规律是：属同一文化谱系，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年代早者可能影响到年代晚者；或者是两个文化区域相邻，发展水平高者可能影响到发展水平低者，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渗透，即低水平者可能吸收高水平的文化因素。”^⑪我想，这样的表述应该符合史前时期中原文化区与辽西文化区关系的客观实际。

至于红山文化“南下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在晋南与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形成‘中国’

本土的基础”的说法，这需要证据来证实，例如在晋南地区的距今四五千年间的考古学文化中，发现源于红山文化的文化因素。

陶寺文化，或称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是晋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距今4300~3900年，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与尧、舜有关的考古学文化，有的学者认为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尧舜之都”，“尧都平阳”。学者们通过研究，“都一致认为陶寺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庙底沟二期文化”^⑫。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800~4300年）处于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在河南、陕西、山西有广泛的分布，其上承仰韶文化，下接龙山文化，在山西“分别发展为龙山时代晋西南地区的三里桥类型、晋南地区的陶寺类型、晋中地区的白燕类型”。他们“同陕西境内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境内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类型及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等类型，共同构成了中原龙山文化这个庞大的系统”^⑬。有学者对陶寺文化谱系进行综合研究，尤其是对陶寺文化早期具有个性因素的器形逐个进行分析，以寻找其各自的文化来源。通过分析认为，这些个性因素“来源或渊源广泛，有些是直接的借鉴，有些是间接的启发。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影响。”因此，“陶寺文化的形成以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文化因素为主体，汇聚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一些因素和黄河中游客省庄二期文化部分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尚不明来源的文化因素，构成了一个内涵异彩纷呈的都邑文化”^⑭。

陶寺墓地出土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彩绘龙纹陶盘（又有称为“朱绘龙纹陶盘”），这种龙纹盘彩绘图案精致，它仅见于大型墓葬，且每墓仅出土一件^⑮。持北方地区为文明起源原生型的学者认为，陶寺彩绘龙纹陶盘“源于红山文化”，并以此作为陶寺文化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性质”的重要证据，其实不然。有学者对该器形制和图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陶寺龙纹陶盘源自中原本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他说：“（龙纹陶盘）虽为低温冥器，但是在（陶寺）居址中和宫殿区生活垃圾里均可见到其形制相同的实用器”；“尽管陶寺大墓出土的龙盘的彩绘图案不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但是龙盘的形制

却见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陶盘的龙造型十分特殊，形似黑鱼有列齿，与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龙造型相去甚远，有可能就是尧舜崇拜的龙，但史籍上没有注明尧舜的（龙）就是黑鱼的样子。”^[2]其实我国古代以鱼为龙的造型是有文献可查的。如《论衡·龙虚》：“龙，鱼之类也。”另有《水经注·洛水》：“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即沉。”《帝王世纪》又载“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始得图书”。这两条文献说的都是上古时期“河图洛书”的故事，它互相印证了能致雨的大鱼就是龙，龙就是能致雨的大鱼。在上古时期龙与雨水有密切关系，龙能致雨不仅在古典文献，就是在殷墟甲骨卜辞中也有反映^[3]。可见在黄帝至尧舜时代，中原地区龙的一种形象就是大鱼。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出土一件彩陶壶 M52：1，其腹肩部绘“水鸟啄鱼纹”，其鱼呈长条形，造型酷似陶寺陶盘上的蟠龙^[4]，方头、豆状圆目，三角形或长方形胸鳍，鱼（蛇）躯鳞身，无不表现出他们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宝鸡北首岭彩陶壶鱼造型就是陶寺龙盘龙造型的祖型（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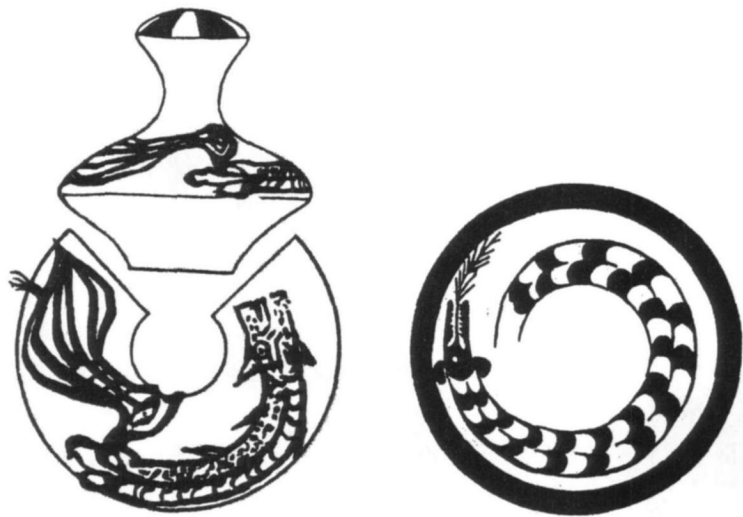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学者对陶寺彩绘龙盘的图案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盘上绘制的蟠龙形象卷曲如勾，实际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社神句龙，图像中蟠龙所衔的树枝，亦即句龙所衔之木，当为社树，也谓之社木。“龙盘以社神句龙衔木，暗寓生木之

土。战国中山王𠙴器铭文及《说文》所载古文‘社’字俱作𡗗，象立木于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木者，各树其土所宜木也。’寓意与陶寺龙盘句龙衔木之意契合。”根据“禹劳天下而死为社”（《淮南子·汜论》）等文献记载，禹即社神句龙，亦即夏社，故认为“陶寺文化龙盘图像实际就是夏社的形象”^[5]。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商周青铜盘的句龙图像与陶寺彩绘龙盘的句龙图像有明显的继承关系^[6]。

因此我们认为，陶寺出土彩绘龙盘，不仅器形源于中原本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而且龙盘图案龙造型与长江流域、辽河流域龙造型相去甚远，也纯粹是中原地区龙的造型。至于龙盘图案所表现的内容——社，绝对是农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其源其流均在中原地区。

由此看来，所谓“（红山文化）南下在距今四五千年间在晋南与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形成‘中国’本土的基础”的观点，在晋南地区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文化谱系研究中，没有得到明确且有力的支持。其一是这种观点强调的红山文化在晋南地区“‘中国’的本土基础”（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地位没有得到确认，其二是被这种观点忽视的中原的本土文化，即仰韶文化以及尔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恰恰又是晋南地区“中国”本土基础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体文化。

我们以为，中国文明起源北方地区为原生型、中原地区为次生型的观点反映的不是历史的真实面貌。其之所以错，一是没有认识到农业经济是文明起源的基础，从而否认了农业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早于农业经济落后的辽西地区，首先出现父权制、文明要素和奴隶制国家这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基本事实；二是没有认识到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是立足于中原本土文化的农业经济，而作为渔猎型经济形态的辽西地区，其红山文化的“中华文明曙光”，主要是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文化影响，从而超越其本身原有的经济基础而出现的。简而言之，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出现如此错误，除了受当时考古发现局限的客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对在文明起源中起着决定



图三 宝鸡北首岭彩陶壶鱼纹（左）与襄汾陶寺彩绘盘龙纹（右）

作用的史前农业经济的研究。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文明的火花并不是文化间的互相“撞击”而发生的,文明的基础也不是来自四方的“文化相聚”而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事物变化、发展的外在原因(外因),即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一个地区文明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史前本土文化自身的发展,即在于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在于其氏族内部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化。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的:“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来自国外的。”^[8]

四、余 论

恩格斯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9]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农业发展状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农业的发展,又往往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辽西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农业,一直受到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干冷气候波动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打击;长江中游与下游两个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单纯的水稻为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在气候波动和水患频繁的双重冲击下极易受到影响。公元前2000年前后,全球气候转向干冷,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位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均由盛转衰,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则强势崛起^[8]。黄河中游(中原地区)地处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的过渡带和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具备水热条件优越,生物多样性,平原、山地、丘陵、河湖等地貌相间,人类生存空间广阔等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其生态系统“具有多重过渡性特征和多重边缘效应,生态适宜性、环境承载力、系统自调节能力均较强,尤其不易发生大范围的毁灭性灾害”^[8]。中原地区分布着面积广阔、沉积丰厚的黄土,“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分矿物成分,所以非常

肥沃”;“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质原始掘土农具的翻掘”;“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中原地区虽属半干旱地区,但“雨量集中在夏季,对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例如谷子”^[8]。上述自然生态环境的区域优势,使得中原地区农业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再加上新石器晚期中原地区又发明了凿井技术,利用水井、水渠进行人工灌溉,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抗击干旱灾害的能力。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的干冷气候事件的强烈干扰下,农业也还是在强势发展,最终造就了中原龙山文化更加发达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农业经济。又有研究认为,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一直比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农业经济发达^[8]。这一系列研究表明,在中华大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无论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都是最为发达的、最为先进的。所以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出现父权制,出现文明因素,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强烈影响的辽西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开始发达,宗教礼仪建筑、铜器铸造业出现,使得辽西地区在距今5500~5000年间的确出现过“文明的曙光”,但是其后的小河沿文化时期,由于自然环境恶化,农业的衰退,使得辽西地区曾经出现过的“文明曙光”,犹如天上的流星,瞬间闪烁,继而消失。而在新石器早期农业经济就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宫室、宗教礼仪建筑、刻画符号、铜器铸造、城址、国家政权雏形的相继出现,使得中原地区最迟在距今550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缕“文明的曙光”。而与辽西地区不同的是,中原地区“文明的曙光”,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地晨光灿烂,最终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北方地区为原生型,中原地区为次生型的观点,完完全全是把历史事实弄颠倒了。我们不可否认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辽西、海岱、江汉、江浙等等地区的先民

们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都曾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中心，他们与中原地区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做出了贡献。但必须认识到，发达的农业经济，以及居“天下之中”的区域优势，使得中原地区自始至终在中国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主导的作用，是它引领着史前华夏诸族完成“新石器革命”，摆脱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非要去寻找什么中国文明起源中原汁原味的“原生型”，那也只能是在中原地区。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明起源多元的“满天星斗”说刚刚出现的时候，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就明确说过：“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当然是在中原地区，直接讲是在河南，再直接点讲是在洛阳（一带）。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⑩事实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中原地区先进发达的农业经济，不仅使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首先出现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首先出现文明的因素，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地，而且还使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唯一顺利地完成中国文明起源的全部历史过程，最终率先跨进文明时代，成为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地。

植业，是人们的习惯说法，也见之于许多论文；广义指“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这是比较准确、严谨的说法，也见之于词典。本文为了表述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含义，暂且约定“农业”一词单指农作物种植业，“农业经济”一词则指“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生产事业”。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 年 1 月 22 日第 6 版。

② 《现代汉语词典》226 页，“派生”条，商务印书馆，2005 年。

③ 朱乃诚：《夏鼐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夏鼐先生纪念文集》，223～245 页，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④ 《现代汉语词典》1075 页，“起源”条，商务印书馆，2005 年。

⑤ 《汉语大词典》第八卷，569 页，“发源地”条，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 年。

⑥ 恩格斯：《致约·布治赫》（1890 年 9 月 21～22 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466～468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

⑦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 年 6 月～1873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598 页，人民出版社，1958 年。

⑧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96～97 页，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⑨ “农业”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说。狭义指农作物种

⑩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20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⑪ 田广林：《辽海历史与中华文明》（2009 年 12 月 29 日），求是理论网，http://www.qstheory.cn/wh/wh-sy/200912/20091229_17960.htm。

⑫ 《科学家：万年前黄河流域磁山已有黍类旱作农业》（2009 年 8 月 11 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8-11/1812922.shtml>。

⑬ 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 年第 7 期。

⑭ 陈国庆：《中国农业起源研究》《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29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年。

⑮ 《8600 年前我国已会酿酒》，《安徽日报》2004 年 12 月 20 日。

⑯ 袁靖：《论中国古代家猪的驯养》《科技考古》第 1 辑，20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⑰ 李友谋等：《裴李岗文化》，94～10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⑱⑲王小庆：《赵宝沟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研究》《考古学集刊》（16），124 页，科学出版社，2006 年。

⑳㉑㉒刘国祥：《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21 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㉓（日）滨田耕作、永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 6 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 年。

㉔㉕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8 期。

㉖㉗㉘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1 期。

㉙ 徐光冀：《富河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78～179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㉚ 邵望平：《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59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世纪郑州考古》99 页，香港国际出版社，2004 年。

㉛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704 页，

-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②7 陈国庆:《中国农业起源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 704页,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
 - ②8 许顺湛:《原始农业概述》《许顺湛考古论集》, 57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年。
 - ②9③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 ③0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第12期。
 - ③1 施雅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 704页, 海洋出版社, 1992年。
 - ③2 夏正楷等:《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2000年第55期。
 - ③3 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其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 ③4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 81页,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3年。
 - ③5 叶万松等:《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
 - ③6 赵志军:《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农业经济研究》《科技考古》第2辑, 6页, 科学出版社, 2007年。
 - ③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十世纪郑州考古》139页, 香港国际出版社, 2004年; 桂娟:《河南新发现龙山文化遗址其中首次发现小麦遗存》(2008年1月25日), 搜狐新闻, <http://news.sohu.com/20080125/n254876486.shtml>
 - ③8 田建文:《山西侯马发现四千年前大型谷仓》《中国文物报》, 1990年3月1日第1版。
 - ④0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634页, 科学出版社, 2001年。
 - ④1 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 ④2④⑩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 114页, 文物出版社, 1997年。
 - ④3④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 113页, 文物出版社, 1997年。
 - ④4 吴汝祚:《论老哈河、大凌河地区的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301页,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 ④5 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 225页, 文物出版社, 2003年。
 - ④7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 ④8 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 228~22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 ④9 刘宗迪:《华夏上古龙崇拜的起源》(2006年10月9日), 中国民族文学网, http://ejl.cnss.cn/news_show.asp?newsid=1215
 - ⑤0 屈川:《龙雏形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 ⑤1 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517页, 人民出版社, 1962年。
 - ⑤2 [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⑤3 高伟:《龙山文化礼制》《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9年。
 - ⑤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 汤淑君:《轩辕黄帝与铸鼎原》《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李新伟:《灵宝西坡遗址的发现与思考》(2010年2月2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网, <http://www.cnss.net.cn/file/20100202257172.html>
 - ⑤5⑤《黄帝大猜想》(2008年5月),《走近科学》杂志, CCTV.COM <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1210060626124610>
 - ⑤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 696页,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
 - ⑤7⑤严文明:《序》《秦安大地湾》,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⑤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 691页,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⑥0 《秦安大地湾》称, 在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轴线附近, 除了已发掘的3座大型房址外, 还发现数处大型房址的迹象, 如F901北150米处的断崖上露出长达20米的红烧土堆积, 其下部极有可能又是一座大型房址。在F901之南百米处的断崖上露出一座有6层居住面, 其表层与F901相同的多次重建的大型房址。
 - ⑥1 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许顺湛考古论集》, 146~147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年。
 - ⑥2 杨鸿勋:《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注2《考古》1991年第12期。
 - ⑥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 701页, 文物出版社, 2006年。
 - ⑥6 [宋] 胡瑗:《周易口义》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⑥7 李东阳:《急皇储疏》, 载[明]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⑧ 李贤：《论太学疏》 载 [明] 黄宗羲：《明文海》卷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⑨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 8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⑪ 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面积和密度的变化，反映了新石器时代人口的增加：a 遗址数量急剧增加，以河南、陕西两省为例，发现整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器加工点仅 130 余处，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遗址 140 余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遗址 2840 余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 3200 余处。b 遗址面积急剧增加，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在天然洞穴里。新石器时代人类走出洞穴，在平地或丘陵的河畔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聚落面积逐渐扩大，新石器时代早期前仰韶文化遗址面积一般 1~2 万平方米，大者可达 10 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遗址大者可达 96 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更是出现二三百万平方米的遗址（城址）。c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度增加，如河南郑州市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遗址 30 余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遗址 100 余处；灵宝一个县级市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 59 处。

⑫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⑬ 李友谋等：《裴李岗文化》，111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57~160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 30~32 页，科学出版社，1999 年。

⑯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698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⑰ 李友谋等：《裴李岗文化》，110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

⑱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1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61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⑳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 页，95 页，10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㉑ 亦有文献记载发生在神农之世，见《庄子·盗跖》。

本文采伏牺之世说。

㉒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 108~11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㉓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 9~34 页，文物出版社，1963 年。

㉔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 698~701 页，文物出版社，2006 年。

㉕ 李新伟：《灵宝西坡遗址的发现与思考》（2010 年 2 月 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网，<http://www.cass.net.cn/file/20100202257172.htm>。

㉖ 李德方：《伊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薄葬习俗述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㉗ 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第 6 期；高天麟：《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汇报》，《襄汾陶寺遗址研究》，163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㉘ 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襄汾陶寺遗址研究》，348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㉙ 1955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张仲实先生的翻译本，将“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译为“原始公社底权力”。

㉚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04 页，161 页，9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㉛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6 页，167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㉜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191 页，人民出版社，1965 年。

㉝㉞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65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㉟㊱ 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 年第 6 期。

㊲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94 页，104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㊳ 何弩：《陶寺文化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研究》 180~183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151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㊵ 高炜：《中原龙山文化葬制研究》，《襄汾陶寺遗址研究》，657 页，科学出版社，2007 年。

㊶ 原报导为绳纹。李德方、张松林先生见告，“绳纹”应为压印纹。

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57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 ⑩ 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考古》1979年第4期。
- ⑪ 赵世纲:《篦纹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 ⑫ 董新林:《赵宝沟文化研究》《考古求知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
- ⑬ 刘晋祥等:《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考古》1996年第2期。
- ⑭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 ⑮ (日)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71~210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 ⑯ 石兴邦:《仰韶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⑰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 ⑱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 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第8期。
- ⑳ 《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上),236页,240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
- ㉑ 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15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 ㉒ 卫斯:《“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襄汾陶寺遗址研究》,44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㉓ 何弩:《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襄汾陶寺遗址研究》,425~42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 ㉔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96页,1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㉕ 何弩:《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述》《考古学集刊》(16),169~17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 ㉗ 何弩:《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述》《考古学集刊》(16),160页,174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㉘ 刘一曼:《略论甲骨文与殷墟文物中的龙》,《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2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105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 ㉚ 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227~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㉛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10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 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 ㉝ 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其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杨雪梅:《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7日第17版。
- ㉞ 宋豫秦:《跋——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辑),324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 ㉟ (美)何炳棣:《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 ㊱ 叶万松:《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经济的比较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 ㊲ 宋豫秦:《跋——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起源地》《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辑),323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向 祎)